

百年大党视域下 确立毛泽东在中央核心地位的历程与启示

薛庆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17

摘要: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地位到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实现党的事业大发展,充分证明确立核心的重要性,为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提供了深刻启示。从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地位起,中国共产党形成在各个历史时期确立核心的传统。这是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的重要经验之一。长征中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推向21世纪。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关键词:毛泽东;核心地位;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3.01.00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3)01-0001-1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建党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深入安源路矿,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赢得胜利。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贫困农民的革命

积极性。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随后,毛泽东与战友们率部向赣南、闽西进军,在中共各级组织帮助下,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作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307-308}的科

收稿日期:2022-12-20

作者简介:薛庆超(1955—),男,河南省南阳市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局长,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等。

学论断。毛泽东从实践上和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问题,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确立为党中央的核心,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经受了历史检验和实践考验。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百年大党,苦难辉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核心地位的确立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中国革命面临的历史环境与客观形势、革命阵营出现的种种挫折与主观矛盾、历史前进历经的疾风暴雨与艰难险阻,呼唤革命队伍出现高屋建瓴、扭转乾坤的核心人物。这一系列“合力”造就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而这也成就了全党公认的历史辉煌。

一、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确立中央领导核心对党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1935年初,在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国革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元气大伤;“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一筹莫展,无计

可施。中国革命需要核心人物的领导,红军需要合格统帅的指挥,中共中央需要高瞻远瞩、经验丰富、克敌制胜、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

1.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核心理地位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当时,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毛泽东没有担任中央总书记,也没有在中央“负总责”,但是,由于他指挥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具体实践,由于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丰富军事经验,由于他总结的红军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为中央领导集体所公认,特别是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长征中多次提出的扭转危局的军事主张,已经被遵义会议所接受、被中共中央所肯定,因此毛泽东在中央已经处于核心地位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4]这是中共中央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核心地位的最新阐述和评价。

2.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指挥红军作战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

核心作用。历史亲历者、遵义会议前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5]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关任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央领导集体重大决策,决定长征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义会议后建立的中共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三人团”,毛泽东是其成员之一,担负着长征中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工作,直接指挥红军作战。在最高政府领导机关,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发布政令和法令,向长征沿途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和少数民族发布各种布告和政策,被中国和世界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艰苦转战到达四川西部草地时,由于周恩来重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对常委工作进行新的分工,确定由毛泽东主管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管军事工作长达41年,直至辞世。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危急的关头作出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的历史性选择,为克服危局、摆脱困境、完成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进入全国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革命战争时期:从长征结束到洛川会议,毛泽东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军事领导工作中处于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革命战争实践最能检验毛泽东作为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的军事运筹能力和统率指挥能力。从遵义会议到长征结束,毛泽东指挥红

军展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信服地凸显了毛泽东在中央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此,中国革命开创了新局面,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地位日益巩固。

1.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落脚西北,毛泽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结束长征。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军当前行动方针与中央组织问题。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怎样去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他提议中央领导成员分两部分行动,“一部分同志到前方去,一部分可在后方进行动员工作”。关于中央军事组织问题,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并提议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他指出:“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他们全权决定。”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同意张闻天提出的方案并决定:(1)中央对外公开用“西北中央局”称谓,对白区则仍称“中央(秘密)”;(2)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3)中央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部队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围剿”;张闻天、博古等人率领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6]。同时,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

东任政治委员。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首次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2.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成为红军最高统帅

1936年9月,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中共中央批准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为统一指挥红军三大主力协同作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为适应新形势,12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命令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后方勤务部兼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各路红军基本上是根据各自情况各自为战。从1936年12月起,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战略方针,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各路红军。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最高统帅。

3.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毛泽东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实际称“主席”)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了动员一切抗战力量,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

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洛川会议讨论了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红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洛川会议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爆发新形势下的行动方针和政策: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人民大众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洛川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浩、彭德怀、任弼时等11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统一指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武装力量。为便于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部队,洛川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简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之后,又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需要毛泽东这样通晓国情、具有丰富革命战争经验、善于制定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核心人物。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率领红军完成长征,迅速打开抗日战争新局面,实现中国革命的大发展。

三、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中央政治局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

的核心地位,是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非常时期作出的非常决策。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能否得到共产国际认可和同意,至关重要。共产国际和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关键时刻发表关键性指示和意见,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行传达贯彻和落实。

1. 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7]141}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尤其是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的组成极为重视。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后,中共中央领导成员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曾先后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遵义会议、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国抗战形势以及八路军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最新发展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非常关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前,首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刚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王稼祥首先说明:“我的报告是根据(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报告、在(共产)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7]138}王稼祥说明自己报告依据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于1938年4月14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的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于5月17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此书面报告作的口头说明和补充^{[7]142};共产国际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时的主要内容^{[7]138}。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具体内容是: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估计——根据共产国际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时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7]138}。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团结问题上,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7]141}。他特别嘱咐:“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7]141-142}这一意见非常具有针对性,着重解决了王明1937年11月从莫斯科回国后企图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问题。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彻底堵死了王明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图谋,对巩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是最有力的支持。

2. 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共产国际确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强调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这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堪称首次,非常重要,对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此前,遵义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事前并未请示共产国际;由于长征的客观环境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等原因,事后也未能及时向共产国际汇报。这时,共产国际充分肯定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强调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

首的领导下解决”^{[7]141},对进一步加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团结、巩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毛泽东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8]90}。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8]90}。这次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3.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地位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毛泽东首次代表中央在中央全会作政治报告。毛泽东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其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9]534}。毛泽东突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10]毛泽东对危害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534}他指出实现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最后,毛泽东代表中央在全会的结论报告中指出: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经验丰富,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17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经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8]94}。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与会同志认真学习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进一步提升了毛泽东在中央核心地位的认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期间,首先是朱德带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师井冈山,革命力量大发展”。接着是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成立的红五军上了井冈山,实现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师井冈山。随后,彭德怀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南征北战,担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总指挥、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八路军副总司令等,以善打硬仗著称,成为名闻遐迩的著名红军战将。长征结束时,毛泽东曾为彭德怀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2]481}在历史上,毛泽东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有一个成熟过程,高级干部对毛泽东的认识和了解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彭德怀说自己对毛泽东的认识就有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兄长,毛泽东年长自己;其次是先生,感到毛泽东很有学问,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再次是领袖,经过中国革命实践检验,认识到毛泽东确实高人一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中共六届

六中全会,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1]

4.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全国性抗日战争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空前发展,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发展到全国,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创建一系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形势新发展新局面给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共产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中央及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的领导干部,和各中央局及省委的团结和统一,是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最基本前提,同时也是争取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和实现建国大业的最重要条件,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犹如生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针对王明在长江局时期对抗中央,擅自发表宣言,破坏党的团结和纪律的行为,全会重申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全会鉴于王明违反组织纪律的事实和张国焘由自立“中央”发展到反党叛党的严重事件,制定了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一系列文件:《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这些文件分别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各级党委、各级党部工作的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特别强调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

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这些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有力促进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有力地增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权威。从此,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行动听从中共中央指挥,成为高级干部和全党的自觉行动。

5.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遵义会议上被推选在中央“负总责”(一般称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掉”“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12]319}。但是,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不主张提这个问题”^{[12]319}。因此,张闻天没有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自己的建议,而是在会后将自己的工作职责逐渐向中央宣传教育部门转移。对此,张闻天1943年在整风笔记(中央领导成员的整风笔记在中央领导层相互传阅、相互征求意见)中写道:“我现在反省我在六中全会上没有坚持的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12]319}“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12]319}

从历史上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新阶段的任务。这次全会传达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地位。这次全会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

统一全党思想,增强全党团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四、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做出历史结论

伟大的革命造就伟大的领袖,领袖是革命的产物;伟大的革命推动伟大的创新,实践创新必然推动理论创新。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大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发展时期。陕甘宁边区聚集着一大批学养深厚的革命家、理论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等,他们立足延安,面向全国,关注中国思想理论发展的最新动向,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1941年3月,社会科学家张如心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3],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3]的概念。同年4月,张如心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中认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4]1941年12月底,张如心担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对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连载张如心撰写的长篇文章《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张如心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认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并将其称为“毛泽东

主义”。该文在延安党政军机关和思想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但是,毛泽东本人不赞成“毛泽东主义”的提法。4月22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15]。但是,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主义”提法的意见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邓拓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认为“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领导成员纷纷发表讲话和文章,表示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思想。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2. 毛泽东阐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形势发展和党的建设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首先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中开始,这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预备阶段。毛泽东一贯重视实事求是问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最早提到实事求是:“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9]522-523}1941年5月,毛泽东古为今用,点石成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

事求是作了新的阐发:“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6]经过整风运动,实事求是成为全党的共识,中共七大将实事求是载入党章,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3. 全党整风运动奠定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思想基础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深刻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深入批判主观主义,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确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所犯错误是“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9月26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各地成立高级学习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全党整风从1942年2月开始,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讲演,在延安干部会议上

作《反对党八股》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论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进一步总结了过去我们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号召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的号召很快引起怎样以从实际出发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1931—1934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提高一步,全党通过分清路线是非,思想上达到空前统一。

4. 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17]448}。作为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7]448}。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兼任书记。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组织上彻底完成了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毛泽东在中央核心地位的确立。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具有“最

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由于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因此,那种认为毛泽东具有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最后决定权”的说法,是一种误解误读。整风运动形成了对党史重大问题认识一致的政治成果。1943年冬,整风运动最后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召开各种类型的党史座谈会,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的经验教训,高级干部重新开始党史学习讨论,对历次“左”倾、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批评,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传达中央政治局对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几个重要问题所作的结论,并对中共六大文件的讨论问题、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等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整风运动形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评价;对历次“左”倾、右倾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了科学结论;高度评价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卓越贡献,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完全统一。至此,整风运动结束。

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毛泽东根据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中国特点和中国实际,实事求是地指导中国革命,赢得了全党信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18]

五、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毛泽东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任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列宁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9]在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础上,中共七大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七大路线,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1. 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大,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在整风运动奠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上,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1]18}。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毛泽东指出,作为一般纲领,“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11]50}。毛泽东认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毛泽东阐述了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些人不了解

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1]55}毛泽东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75}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多次阐述七大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1]234}毛泽东的论述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方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2. 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毛泽东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述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同时全面阐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20]319},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最杰出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

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20]319-320}。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20]333},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333}。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党章还规定,必须在党的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中国共产党实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是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3. 毛泽东认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8]610}

中共七大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有了明确认识,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团结。中共七大闭幕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会见从重庆来的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黄炎培等就团体、政党乃至国家存在的周期率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问黄炎培等在延安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21]毛泽东郑重地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610}

整风运动统一全党思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共七大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成确立毛泽东在中央核心地位的全部程序,中国革命胜利指日可待。

六、中国共产党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留下深刻启示

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22]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东方大国,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无与伦比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地位起,中国共产党形成在各个历史时期确立核心的优良传统,这是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的重要经验之一。

1. 长征中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先领导开创农村根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解决了人民军队的克敌制胜问题,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创新党的建设解决了在一个东方农业大国锻造无产阶级先锋

队问题。从遵义会议到1966年4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30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30年。“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不要四面出击”“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4]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总结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与挫折,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确立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形成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4]

3.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21 世纪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21 世纪。

4.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5.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在经济建设上、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在政治建设上、在全面依法治国上、在文化建设上、在社会建设上、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在外交工作上,都呈现出新时代新气象新面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使 14 亿中国人民过上了全面小康生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4]

列宁强调:“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23]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创造的重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确立核心的必然性和正确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5.
- [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 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01).
- [5] 邓力群. 介绍和问答: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68.
-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 张闻天年谱:上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93.
- [7] 王稼祥. 王稼祥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毛泽东. 论新阶段[N]. 解放,1938(57).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45年4月—6月[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31-232.
- [12]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 张闻天在1935—1938年(年谱)[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 [13] 张如心. 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J]. 共产党人,1941(16).
- [14] 张如心.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N]. 解放,1941(127).
- [15] 毛泽东.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12.
-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 [17] 金冲及. 刘少奇传: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简明注释本)[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5.
- [19]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1.
- [20]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1] 黄炎培. 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204-205.
- [2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2.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专题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4.

[责任编辑:毛丽娜 武威]

引用格式:薛庆超. 百年大党视域下确立毛泽东在中央核心地位的历程与启示[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1):1-14.

